

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艺术设计的影响

卢世主

1.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两个时期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工艺品和介绍西方科技、艺术的书籍,将西方的文化技术传入中国。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使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炼丹术和阴阳五行说等逐渐在一定范围内被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所取代。中国学者参合中西,建立了“新学”,中国传统的“士林”重义理轻技艺、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受到科学技术、民主自由意识的强烈冲击。尽管国人对这些舶来品心存抵触,但西方近现代工艺品设计的科学性和它们体现出来的理性美则为国人倾慕,使用西方物品在富裕阶层日益广泛,少量物品甚至普及到发达城市的普通民众之中。西方文化艺术也由此逐渐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传统的造物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考察西学东渐的历史可知,基督教在唐朝时就已传入中国,据明天启五年(1625)在长安(今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碑”记载,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由聂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的一位教主阿罗本介绍到长安,他受到了唐太宗很高的礼遇,“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揔(同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其真,特令传授”(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基督教在宋代、元代也在中国流传。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广泛地接触,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则始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当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和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西文化融会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随着西方宗教同中国的原始民族宗教的“中国的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和清政府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导致了清朝雍正年间的禁教,由此双方在宗教关系上进入了一个多世纪的“冷战”时期,西学早期的输入基本终止,直至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宗教才又重新

得以在中国传播(参见安宇《冲撞与融合——中国近现代文化史论》)。因此,传教士对中国造物艺术的影响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明清时期和晚清以后的时期,后一阶段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前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段西方文化输入的主体都是传教士。不同的是,明清之际基本上是在东西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晚清时期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暴力展开,带有强制与威逼的色彩。

2. 基督教对中国传统造物观的影响

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的主观目的是对民众进行“精神征服”,客观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造物设计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近代欧洲社会分工还没有细化的时代,不少学者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具有艺术才能,他们集科学家、画家、设计师于一身。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在传播教义的同时——甚至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而将自己的多方面才能发挥出来,从而对中国造物设计产生影响。晚清时期,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并深入到广大的内地。虽然传教士充当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在传教过程中还有许多欺凌、残害中国人的不仁之举,“教案”不断发生,但他们在传教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展示、传播于民众。他们修教堂、办教育甚至建工厂,主张以科学技术手段来传教布道,以艺术来感化人心。这种行为,一方面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近现代科技的知识,而在中国开设的各种机构、工厂企业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也使西方的装饰工艺逐渐融入到中国的工艺美术之中。

西方文化的引入,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使中国的传统造物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督教对中国传统的造物艺术的影响,笔者将分为三个部分论述如下:

其一,传教士携带的西方器物的直接输入,使中国的传统造物方式和民众审美观念发生变化。

自明末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各种西洋器物大量传入中国。开始,传播速度很慢,而且仅仅是局部进入,这些器物包括眼镜、显微镜、钟表、镜子等。如利玛窦就向万历皇帝“献天主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等(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当时,初到中国的“西洋奇器”以其科学而新颖的设计和精巧的制作工艺引起国人的好奇甚至喜爱。到清代末期,传入速度加快,并在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发达城市中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据记载,当时不仅贵族官僚阶层喜用洋货,而且如电话、电灯、洋服等也进入了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这些外来物品渐渐成为中国沿海和一些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常用物品。洋货在中国广泛传播,使用洋货成为时尚,并与传统的中国器物展开了竞争,以前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此时开始真正受到了威胁。在鸦片战争后很短的时间里,传统手工业的三十二个行业中就有七个因受到西洋物品的“冲击”而衰落(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结构,而且打击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些地方,“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开始解体,适应机器生产需要的现代造物艺术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洋货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出现了融合西方装饰工艺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如清宫廷的造办处内设“造钟处”,借鉴西方的造钟技术,造钟的工艺和科技含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南方的广州、苏州等城市钟表制造业也相当发达,有“广钟”、“苏钟”之称,这些城市钟表制造业也主要是仿造西洋的钟表,钟表的外形设计和装饰手法融合了中、西工艺的精华。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的艺术和工艺装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的工艺品也源源不断地销往欧洲,近代江南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瓷器、纺织品、家具等工艺品和装饰画,造型和纹饰都努力适应欧洲市场的需要,呈现出种种新的特色(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产品由于外销的需要而进行的设计、工艺的引进,使西方造物观更加深入地影响了中国。欧洲的近现代设计思潮的涌入,中国的造物思想逐渐形成了“半中半洋”的模仿潮流,适应机器生产需要的现代设计艺术由此而逐渐萌发出来。

其二,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近现代科技知识,改进了中国造物的技术手段。

一个时代的造物艺术总是和当时的科技水准相

适应的,造物艺术是一门强调美的实用艺术,它的功能和外形的实现依赖于当时的制造条件、制造技术、材料和工艺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造物艺术的美是工艺技术手段所赋予的。托马斯·门罗认为:“艺术和我们现在称为‘应用科学’的那些更加具有功能性的技术之间没有基本的和明显的差别”,“艺术将在更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技术”(参见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记录我国早期造物活动的《考工记》就已经表达了手工业技术对于造物艺术的意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知者”就是智者,“圣人”本是对有智慧之人的尊称,有智慧的人创造了物品,手巧的人照着样子作出来,一代一代地承传,成为一种职业(参见张道一《考工记译注》)。中国造物史上,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还有战国时的编钟、明代的家具等都是杰出的艺术品,同时又是时代新技术的结晶。外国传教士带来了大量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带来了大量介绍西方建筑、美术、工艺的知识书籍,虽然这些科学技术并没有把欧洲最新的科学成果全部介绍到中国,但这些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养料,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眼界,促使中国文化开始慢慢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国传统造物艺术带来了新的设计思想,促使中国造物艺术对于科技的重视。

传教士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著作,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熊三拔译的《泰西水利法》、艾儒略译的《几何要法》和《西学凡》等,明清时期北京的耶稣会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关于西方建筑和工艺的书籍。一些传教士还特意为中国读者撰写了有关西方建筑和工艺设计的著作,如邓玉函(Jeannes Terreuz)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由王徵翻译,并于明天启七年刊行,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机械工程的著作,清代前期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成为中国古代工艺典籍的组成部分(参见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洋务运动中,官僚创办的同文馆也主要聘请传教士来承担翻译和教学工作,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设于1868年,先后聘有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西方书籍……译书内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先后共译各类书籍159种,总数达1075卷”(参见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这些书曾公开发行,有些书被后来开办的各类

新式学堂作为正式的课本。为了传教的需要,外国传教士还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其中有很多关于工艺的论述,这些报刊对传播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教会从事的教育活动中的工艺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了各社会阶层,特别是民间画师和工匠,从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成“洋画”和“洋货”时尚。

教会以办教育的形式来传播西方文化,是晚清时期才出现的。这时期,教会的传播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是整个社会。譬如京师同文馆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主持下,从初期的外语学院,发展成系统传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大学。后来,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教会大学,也基本遵循这样的发展路径。这些教育机构在传播西方文化与引进新的教育制度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19世纪后期,由于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西方国家原有的手工业受到排挤,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就设法把西方的劳动密集型手工业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廉价劳动力生产他们所需的工艺品和中国市场上所需的“洋货”,以赚取高额利润。因此,教会在中国沿海开办了一些工艺传习所。到1905年,教会在华所设的工艺学堂已达七所,开设的工艺科目繁多,仅南京一地的工艺学堂就有木工、铜工、织布、造毯、编席、制褥、刺绣等科(参见来仪庭《教会工艺之概况》)。有的教民学成后回乡再传授给更多的人,甚至以此开办学校。如20世纪初教民在常州开设的虞阳花边传习所和虞阳刺绣专门学校等,传授的范围更加广泛。

这些教会工艺学堂中,较有规模和影响的是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美术工场。从1864年建立到1953年解散,该工艺所始终保持着很大的学员群体,培养了许多美术和工艺设计人才。其中周湘、刘德斋、徐咏春等人成为中国西洋画创作与现代美术教育的拓荒者。土山湾美术工场的教育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是中国现代教育模式的初期形式。

当时,育婴堂所养之孩童,幼者为六、七岁,大者亦不过九、十岁,初授以四年之教育,如国文、习字、算术、天主教义等科,平均至十三岁,始就各童之天

资性质而授以某种工艺,至十九岁而毕业,仍留堂居住,至结婚而始离去,而工友中颇多工作至老而亦不远去者。据徐蔚南著于1940年的《中国美术工艺》一书记载:“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图、照相、冶铁、细金、木工、木雕、泥塑、玻璃制作等”,“全部人员约六百五十人。”该工场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卖,种类繁多,数量也极为惊人,仅就印刷而言“印刷工场全部工友,约一百二十人。每年出品,平均西文者约五十种,凡二万五千卷至七万五千卷之数,中文者亦五十种,达二百五十万卷至三百五十万卷。每年纸之消费在五十吨以上。附装订作,各种洋式装订,坚实而朴素,然仍不失为艺术之美,传至西欧,颇得士林所赞许”(参见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这些教会工场开始尝试设计与制作分离的生产方式。据1917年第2期的《教育与职业》杂志载的文章《参观上海土山湾工艺局纪要》记载,工场中“每制一器,先令打样,绘成精密之图样,然后交由木工场依样制作,此则与中国木工不同也”。在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美术家先后在土山湾美术工场中学艺,这些美术家以后活跃在上海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20世纪早期的艺术设计师,对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导致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教士不但带来近现代科学知识,还带来西方的艺术观念和西方工艺器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造物观念。教会在中国办工厂和学校,培养了大量的设计和制作人才,为中国手工工业向近现代机械工业转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起步开辟了道路,中国的造物艺术开始了曲折、艰难的转型。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项目(编号:07CF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